

洪银兴 著

JINGJI
ZHUANXING
HE
FAZHAN
YANJIU

经济转型和发展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JINGJI
ZHUANXING
HE
FAZHAN
YANJIU

洪银兴 著

经济转型和发展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责任编辑：吕萍 张辉
责任校对：王肖楠 杨晓莹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邱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转型和发展研究 / 洪银兴著 .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11

ISBN 978 - 7 - 5058 - 7692 - 7

I. 经… II. 洪… III. 经济发展 - 中国 - 文集
IV. F12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6561 号

经济转型和发展研究

洪银兴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汉德鼎印刷厂印刷

永胜装订厂装订

787 × 1092 16 开 40.75 印张 640000 字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58 - 7692 - 7/F · 6943 定价：5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经济转型和转型经济理论研究

——洪银兴教授访谈（代前言）

记者：洪教授，根据不完全统计，您从197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开始到目前为止已经公开发表252篇学术论文，从南京大学图书馆信息查询系统可以查到的您的专著和教材（含合著）合计已达35部。从您发表的成果看，您在转型经济研究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请您讲讲转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洪银兴：我国目前正在推进的经济转型要涉及三个方面：（1）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即市场化；（2）发展阶段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即现代化；（3）经济由封闭向开放的转型，即国际化。由此发生了多个层面的变化：市场态势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企业制度向公司制的转型。对转型内容和目标的研究及转型期摩擦和矛盾的分析，就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理论的重点。

体制转型，主要涉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其中包括与发展市场经济相关的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研究体制转型的理论工具既有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理论，也有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其理论基石包括产权、国家

制度、意识形态三个方面，还有斯蒂格里茨所提出的转型三要素即产权、市场、分权理论。根据这些理论，体制转型不能是单方面的，而是全面的。正如社会主义可以有不同模式一样，市场经济也有不同的模式。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有路径依赖，不能简单地以美国模式还是日本模式作为转型的目标。体制转型的研究还涉及转型路径的选择和转型成本问题的分析。应该说，体制转型无论是选择哪种路径都有成本，最低转型成本路径选择和降低转型成本的制度安排，就成为转型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无论是体制的转型还是其他方面的转型，都要以实现现代化作为转型的目标，市场化实际上是为实现现代化提供制度保证，脱离现代化的目标，为市场化而市场化，这种经济转型是没有意义的。因此，经济转型内在地包含经济发展。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实际上是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过程，即“转型中发展，发展中转型”。

对于转型的效果，特别要强调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协调。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无序和混乱现象以及不稳定的问题，可以用改革和发展不相协调来说明。改革和发展的协调指的是，改革的任务必须由发展的任务提出，改革的战略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的战略，与此同时，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是改革发展和稳定是否协调的重要标志。经济发展有多方面要求，改革的效应不可能同时满足发展的所有要求，某项改革措施的效应对某种发展要求可能有利，但对另一些要求可能不利，这就需要从发展方面衡量改革的成本和效益。特别要注意的是，虽然从理论上说改革能解放生产力，但不等于说每一项改革措施都会立即带来发展效应。因此，协调改革和发展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一切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改革应该先行。

当今中国的经济转型不能离开国际化背景。由封闭走向开放，再由开放走向国际化，不仅仅是进入国际大家庭，更为重要的是利用国际化发展自己，增强自身的竞争力。WTO 的基本规则是市场经济国际化的规则。按照 WTO 的规则改革政府，按照 WTO 规则规范市场秩序，必然会大大加快我国的经济转型进程。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加入 WTO 以后面临的任务是，抓住时机根据现代化的目标推进产业升级，其基本要求是国际分工结构由目前的比较利益结构转向谋求竞争优势。就中国加入 WTO 的效应来说，中国贸易自由化的承诺不只是对外商，同时也包括对国内的各种所有制经济，特别是对外贸易的权利赋予包括私有经济在内的各种所有制经济。原来只给外商投资企业享受进口关税优惠政策也会惠及中国的其他类型企业。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的高技术含量的投资品和中间品进口用于加工贸易和替代进口，中国产业升级的进程会进一步加快。在中国加入 WTO 以后，进入中国的高科技制造业外资、现代服务业外资和世界 500 强企业会明显增加。这不仅可以提高我国的技术和产业水准，也会提高我国的市场化水准。

记者：我们知道您的学科背景是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方向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您能否讲一下政治经济学与转型经济理论是什么关系？

洪银兴：经济转型需要得到人民的理论支持。尽管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可以为经济转型提供理论指导，但是，我国经济转型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还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要能承担起指导经济转型的历史重任，必须与时俱进，必须不断吸收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积极思想，同时又要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吸取营养。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以转型经济研究为重点，不仅反映政治经济学的与时俱进，同时也能充分显示其对现实经济的理论指导。

记者：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中最古老的学科，因其与时俱进，因此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特别是成为转型经济学的指导思想。您能否介绍一下直接影响经济转型的政治经济学任务的重大转变。

4 **洪银兴：**从马克思到列宁所建立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推翻旧社会。从斯大林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建设新社会。但是，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建设新社会的基本思路是阶级斗争，与此相应，政治经济学就以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为纲。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两代领导集体建设新社会的基本思路是经济建设，与此相应，政治经济学就以增进社会财富为出发点和归宿。由此决定了现代政治经济学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区别。

政治经济学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在当今的社会主义社会则是经济建设的理论指导。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分析的任务，固然有坚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信念的要求，但不限于此。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应该以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增加国民财富为目标。马克思在 100 多年前批判资本主义时，合乎逻辑地推导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特征，这些不应成为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教条，而应该成为行动的指南。我们不应固守马克思当时提出的某些个别结论，而应该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实践，发展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①

对与社会主义并存的当代资本主义作政治经济学分析，必须注意到并存的两个社会的相互影响和竞争。从 20 世纪 30 年代大危机以后至今，几次重大的科学技术革命都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在此基础上，以公司制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发达

^① 洪银兴在《由批判转向建设——论〈资本论〉研究思路的转变》一文中对此作了系统阐述，见《南京大学学报》1998 年第 6 期。

的资本市场，现代银行制度，政府干预经济，科技创新机制等都成为推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机制。这些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突破其生产关系的束缚得以发展的主要说明因素。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包含了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同时也包含了产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与先进社会生产力相关的现代经济组织和企业制度的全球化。就如马克思和列宁当时所讲的股份公司、国家垄断是社会主义的人口一样，这些现代经济组织和企业制度可能离社会主义更近。

在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后，政治经济学任务的与时俱进就突出表现在，为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作出理论贡献。与此相应，政治经济学的功能就要有根本性变化。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不是提供阶级斗争的理论，而是要提供阶级合作的理论。按照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要求，政治经济学需要提出和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概念，需要提出和研究保护私人财产的制度，需要引入制度经济学中的契约理论，需要根据各种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和管理按照企业所确定的份额投入企业并按贡献参与分配，需要寻求劳资合作的有效方式。

记者：中国的经济转型是渐进式的。您能否讲讲我国经济转型不同阶段的任务？

洪银兴：经济转型理论把转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各个原先的计划经济国家推进自由化、市场化的改革（在苏联和东欧国家还包含着放弃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针对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各个转型国家普遍出现的经济波动、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失业、腐败等问题，推进以追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为内容的改革。

当今世界上进行经济转型的国家较多，各国转型的具体目标和路径不尽相同。不同的国家推行不同的市场经济市场，实

6

行不同的转型步骤，转型的效果也很不一样。在经济转型的第一阶段，不同的国家市场化的重点不同，如波兰、俄罗斯等国家重点在私有化，中国的重点在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改革的速度不一样，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基本上都采用了大猛击（Big Bang）式的“休克疗法”战略，我国则实行渐进（Gradualism）式改革战略。虽然，进行经济转型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出现了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不稳定的状态，但是，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显著高，经济增长率显著低，甚至多年处于负增长。与此相反，实行渐进式改革的中国，在转型阶段经济增长率持续处于高水平（10%左右），通货膨胀率也比这些国家低得多。实践证明，渐进式的经济转型不但不会破坏生产力，还会由于市场化改革的顺利进展而产生明显的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一些国外学者在比较中国和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转型效果后得出的结论是，一方面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比其他国家早；另一方面中国首先推进经济改革而没有首先进行政治改革；再一方面中国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中国实行的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的重要特征。这些因素在中国经济市场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是我国经济转型较为稳定的重要说明因素。尽管如此，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已进行了20多年，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不可回避，因此，以政府改革先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便成为改革的新内容。与此相应，转型经济学需要研究经济改革与政府改革的相关关系。

经济转型第二个阶段有三大任务：一是建立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机制。经济转型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不稳定因素，不仅仅是通货膨胀，通货紧缩也可能出现。现实中一些转型国家已经出现了经济的停滞或衰退，甚至是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因此经济转型研究的新课题担负起寻求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使命。二是企业重组。调整和优化企业结构的前提是根据市场化要求改革所有制结构。在市场化改革的初期，市场

化是在制度外发展非国有经济。企业重组不可避免地触及到国有企业（也包括其他类型的公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变动。现在已经明确，股份制可以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因此，除了一部分中小企业改制为私人企业外，相当一部分企业通过吸收私人资本或其他法人资本的途径形成多元股权的公司制企业。三是建立市场秩序和规范。在转型阶段的第一阶段，基本上是通过放开的方式来实现市场化的。放开以后没有建立相应的市场秩序和行为规范，就可能产生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之类的市场混乱、腐败之类的政府失败。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来建立市场秩序和规范，已有的市场化成果就会丧失殆尽。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今，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实践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态势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宏观经济非均衡的主要特征由通货膨胀转向通货紧缩；经济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成为结构变动的重要推动力。与此同时，转型中的摩擦和矛盾正在显现，市场秩序的混乱，信用的缺失，失业和下岗的剧增等无序现象又成为经济转型的阻力。而这些问题正是这个阶段转型理论研究的重点。

记者：据我们所知，您现在正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秩序和竞争规范研究”的课题，这是当前体制转型的重要方面，能否请您讲讲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洪银兴：中国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不能从头就走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不能重复出现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并已经开始纠正的问题。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阶段性，中国的市场经济应该同现代市场经济结合而不是同古典的市场经济结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高起点上借鉴现代市场经济理论。

市场秩序和竞争规范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 20 年后又面临

新的转型课题。研究这一课题需要突破已有的研究框架。首先，已有的研究思路是在“三要素制度框架（政府、市场、企业）”中强调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培育市场。但这种思路无法避免政府常常作为利益相关者，凌驾于市场规则之上。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又往往是政府干预市场的结果。因此，规范市场秩序的前提是规范政府干预市场的秩序。其次，已有的对市场体系的研究较多地重视产品市场的发展，忽视其他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甚至是区域性市场的发展和规范。其后果是配置的资源不完全，市场的调节功能不协调。

对上述问题的理论解释涉及市场经济范式的转变。新古典的市场经济范式以竞争为中心，市场失灵主要限于市场力不能及之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也只能限于保障市场竞争机制的充分召开。现代市场经济范式以斯蒂格里茨为代表，其基本前提是市场本身存在缺陷：一是市场信息不完全；二是市场调节有成本；三是政府干预也会失灵，因此其市场经济范式以制度为中心，以合作博弈作为制度建设的目标。通过制度来规范进入市场的各个行为者的行为，建立起有效的市场秩序。

市场不完全，特别是信息不完全，导致市场行为者博弈不合作。其现实表现是假冒伪劣和坑蒙拐骗盛行。因此，建立市场秩序的关键是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就是博弈规则，即合作博弈的规则。针对现实中存在的因信息不完全造成的失信状况所作的制度安排：一是信息披露规则；二是建立某种激励和约束机制。使守信用者得到利益刺激，不守信用者受到惩罚。这种机制的制度安排包括合约和声誉机制。一般说来，对违背合同、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之类的行为可以诉诸法律，依靠法律对破坏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进行惩治。降低治理市场秩序的制度成本需要建立守信文化和道德准则。有些行为政府和市场调节不到，或者政府和市场的调节都没有有效，这就要引入第三方力量即中介组织的监督。所有这些治理市场秩序的制度安排都

有其特定的功能，不能因为比较其作用效果而得出某种制度可以替代另一种制度的结论，只能说一种制度的缺陷可以被另一种制度弥补。因此，各种制度安排的功能是互补的，各种治理市场秩序的制度作为整体来发挥作用。

建设统一市场，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关键环节。统一市场可以从多角度作出规定：从市场体系规定，统一市场是指完善的市场体系；从产品和要素的流动性规定，统一市场是指要素自由流动，企业自由流动，产品和服务自由流动；从各类市场主体的市场地位规定，统一市场是指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地进入各类市场并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从市场规则规定，各个地区的市场规则统一，各个地区市场按照统一的规则运作。严格地说，我国的统一市场一直没有形成。现阶段的市场分割还不是指对统一市场的分割，而是指现有的市场是被条条和块块分割，没有形成统一市场。其根子在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分割和肢解。因此，统一市场要求政府改革深化。其关键是科学界定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应该干什么和如何干，实现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化。

记者：您刚才介绍了当前改革层面上的转型问题，下面请您结合您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谈谈发展层面上的转型问题的特殊性。

洪银兴：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不仅仅是经济总量的增长，更主要是结构的变化，是经济发展从二元经济阶段向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的转型。其中包括四个方面的结构性转变：
(1) 劳动者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即工业化过程；
(2) 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比例发生了变化，即城市化过程；
(3) 工业自身尤其是制造业内部的结构变动；(4) 服务业部门的结构转变。

由于我身处发达地区，自然而然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极为关注。目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二

元经济结构向库兹列茨描述的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的转型。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是城市化问题。

我们一直将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意义上的城市化。在实践中我国创造了人口向小城镇转移的城镇化模式。现在我国相当多的地区基本上处于这个阶段。我在这里要指出城市化的新定义，即突出城市功能（市场中心）意义上的城市化。在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和正在进入这一意义上的城市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不能再称为城镇化，恰恰是要改变已有的城镇化模式。先进生产要素、市场、公司、现代服务业向城市聚集构成了城市化的新内容。

城市顾名思义是市场中心。城市作为市场中心，具有特征性意义的是生产要素市场的中心。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向城市聚集。由此使城市成为现代化的中心，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的策源地，先进社会生产力和现代市场的载体，带动乡村现代化的龙头。从全国范围来说，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可以由各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差异来说明。在落后地区，城市太少、城市太小、城市功能太弱，也就聚集不起生产要素，聚集不起经济发展的能量。

过去以苏南为代表，以发展小城镇为主要内容的城镇化起过历史作用，也留下了削弱城市功能的问题。因此，现阶段的城市化，要由突出人口流动转向功能提升。在城市化已达到较高水平的经济发达地区应该由以发展小城镇为特征的城镇化转变为以现代化为内容的城市化：一是增加城市供给；二是推进城镇城市化，强化城市功能；三是推进城市现代化，提高城市质量。

发达地区的城市化进入突出城市功能的阶段，涉及城市要素和产业结构的结构性转型。服务业是城市化特别是城市现代化的载体和依托。服务业与城市化有互动的关系。在短缺经济年代，城市成为经济中心，是因为它是工业中心。现在，工业

制成品处于买方市场，工业中心不再是经济中心，只有是市场中心才能成为经济中心。因此，强化城市的市场功能与提高城市中服务业比重相关。这一轮城市化，进城主体，主要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农村人口进城，而是先进的生产要素特别是高科技与高科技人才进城，是服务业进城。制造业出城，进入城镇导致新的意义的城镇化。现代的城市化不仅是要素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同时也包括城市要素向城镇和农村扩散的过程。

城市化不仅要解决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问题，还需要解决城乡一体化问题。城乡一体化是现阶段城市化的重要内容。城乡一体化，并不是城乡均质，其基本含义是通过体制一体化、城镇城市化、产业结构一体化、农业企业和农民市民化，把城市与乡村建设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体，充分发挥城市与乡村各自的优势和作用，使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技术、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合理的交流与组合。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核心在于，强化都市圈内的中心城市的市场功能，发挥中心城市对外围区域的支配、联系和溢出等效应，促进城乡设施、产业、空间的紧密联合乃至融合。

记者：您先后在《经济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多篇关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论文，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能否谈谈您在这方面的观点？

洪银兴：由封闭转向开放本身就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方面，由突出比较优势的开放转向突出竞争优势的开放是开放型经济转型的方向。这意味着我国的开放型经济由数量型转向质量型和效益型。

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有个认识和发挥自己的优势，并据此调整制造业结构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需要从研究比较优势理论入手研究国际竞争优势。通常的理论是突出自己的比较优势。具体地说，我国的制造业可以依据自己的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调整制造业结构。基于资源

和劳动密集的比较优势有两个角度的考察：一是从产品角度的考察，即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二是从投入要素角度的考察，涉及投入劳动和资源要素的比较成本。长期以来，我们是依靠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国际分工使得各个国家专业化的生产最适合本国生产的产品，通过国际贸易可使贸易双方获得更大的福利。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可以发挥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这反映了我国的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但是，现在需要研究的问题主要在于，这种贸易结构能不能长期化？大力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能否提高我国产业竞争优势？特别是在现在，在制造业全球移动的格局中，单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不能成为制造业全球移动的目的地，世界工厂也不可能建立在这种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基础上。现实中，凡是突出此类比较优势的地区都是经济落后地区，无论是经济落后国家还是经济落后地区都没有因其具有比较优势而改变自己的落后地位的。

现实中，同一种产品究竟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在不同国家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同样一种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可能是以密集的劳动生产的，在发达国家可能是以密集的资本生产的，那么，在国际市场上，面对发达国家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具有竞争优势。而且，虽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其工资低而劳动成本较低，但发达国家面对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会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这势必又出现比较利益“陷阱”：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中，以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

比较成本说是静态的，其前提是各国的供给条件、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再加上当时

贸易保护盛行。在这种假设条件下，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及其产品才可能进入国际市场。问题是在现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些假定条件已经改变。首先，生产要素、资源可以在国际流动。其次，在新技术革命浪潮推动下，资源、劳动可以被资本和技术所替代，就是说，经过投资和新技术的采用，自然资源可以被改良、再造，也可以被新材料所替代；经过人力投资，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又可克服劳动力数量不足的矛盾。所有这些表明，以本国拥有的资源的相对优势来确定自己的国际贸易结构，虽然能获得贸易利益，但不能缩短自己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

特别要注意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包含各个国家要素价格（包括劳动价格）出现均等化趋势。这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品中的劳动成本有提高的趋势，其结果是进一步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过去各个国家特别重视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其背景是存在严重的贸易壁垒和要素流动的壁垒。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比较优势对一国的意义明显衰减。经济全球化包括自由贸易的全球化，投资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资源，不仅包括本土的资源，还包括外来的资源；就是说，资源不仅包括国内的资源禀赋，也包括从国外进入的资本、技术和管理，在不少产业部门很有可能是从国外进入的资本和技术要素起主导作用。这时一国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已不像过去那么突出，或者说，比较优势在许多场合可能不是禀赋资源的比较优势，可能会是外来资源的比较优势。如果进一步考虑到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劳动和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更无竞争优势可言。因此，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也是基于劳动和资源的产品的比较优势终结过程。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为例，目前大量的国际制造业资本向该地区集聚，该地区的企业迅速地参与了国际制造业分

工体系。但是，本土企业处于的生产环节基本上都是在分工链末端，极不稳定。因为本土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是该地区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如果本土企业不培养自身的竞争优势，那么，该地区将难以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14

基于对以上比较优势理论的反思和对竞争优势的战略性考虑，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在新的层次上培植产业竞争的比较优势。从现阶段制造业的全球转移的趋势看，制造业移动的目的地与该地的产业等级密切相关。我国要能接受具有较高等级的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制造业或世界工厂的进入，所必需的条件是，自身要进行产业升级，实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替代。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升级的目标应该定位在波特所说的“一国产业是否拥有可与世界级竞争对手较劲的竞争优势”^①。

虽然我们抛弃了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意义上的比较优势，但还要注意在新的层次上培植产业竞争的比较优势。原因是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每个产业中都具有竞争优势。在波特看来，具有竞争优势的比较优势“集中在特定产品或产业的环节上”^②。于是在这里有了不同于资源禀赋意义的比较优势概念：在特定产品和特定产业环节上的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是先天的资源禀赋的，而是后天的，需要创造的。这就是波特所强调的创新，特别是在科技创新基础上的产业创新。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培植产业竞争的比较优势不能封闭式进行，需要利用国际资源，特别是需要引进国外先进产业。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为了创造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国家要在市场选择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引进和高科技投入等途径有重点地培植一批技术含量高、出口前途好的产业部门，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①②} 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天下远见出版公司 1996 年版，第 37、16 页。